

世界体系结构与边疆问题： 以欧亚为中心的思考

袁 剑

摘要：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构化论述，影响着人们对于区域特征与定位的认知。作为世界主要区域之一的欧亚大陆，诸如中亚这一欧亚边疆区域，影响着欧亚大陆区域性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在古代丝绸之路网络、近代殖民帝国秩序中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的巨大转变。经由对贡德·弗兰克对于中亚及其世界体系地位的经典叙事的解读，可以进一步理解边疆在理解和认识世界体系结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加深人们对于中国—中亚关联性的理解与认知。

关键词：世界体系；结构；边疆；欧亚；关联

中图分类号：K1、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5—0101—07

一、作为整体思考架构的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作为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整体性理论框架，在理解整个近代世界的经济关联与区域关系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手段与工具，有助于人们理解东西方经济结构以及第三世界的历史与地位问题。世界体系理论的关键假设性前提之一是必须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为此，需要关注整体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如区域、国家、民族、阶级等）的社会变迁。在这当中，首先需要明确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其中最典型的分析单位就是国家。世界体系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从体系组成部分的变化切入来分析它对于整个世界体系以及体系中其他组成部分所造成的影响，这是一种从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一是从世界体系整体性的变化出发来分析其对于体系内部组成部分内在动力与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分析路径。世界体系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通过对世界体系长期变动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从近代甚至五百年前至今，世界各国和各大区域在世界贸易和分工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在国内学术界以往的讨论和分析中，曾经从中心—边缘关系的角度对东亚、拉美等区域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从中揭示了东亚如何在近代逐渐成为整个世界分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项目号：21AMZ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 剑，男，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天池英才、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议题研究。

工体系的附属部分,并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成为西方力量的边缘角色;此外,学界还对另外一个大的区域——拉美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并指出,尽管这一地区在近代已经逐步走向独立,但它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依附地位,而这种依附地位直接影响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使其无法从发展中国家向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状态跨越。这些讨论,深化了当下对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并为进一步思考世界体系结构的关联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氛围。

沃勒斯坦在其 2011 年的英文版第一卷序言中,曾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所涉及的空间边界问题:“本书的论点在于,存在着实际的边界,据此能够区分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内部和外部。我主张,在这些边界的内部,人们能够划分出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不过,第六章专门考察了在这些边界之外的地区,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我试图确定人们怎样才能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外部竞争场之间做出区分。”^①他进而指出,“一旦以社会体系为研究对象,以前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便变得毫无意义。”^②社会体系的超国家性,必然带入对具有超国家性的诸多要素,诸如世界体系、跨国网络以及普遍边疆的认识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欧洲世界体系逐步形成。“从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这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占有大帝国一样的空间并具有某些帝国特征。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会出现过的社会体系并具备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它与帝国、城市国家或民族国家不同,它是一个经济统一体,而不是政治统一体。”^③即便如此,世界其他区域的多重世界体系也日渐成型。欧洲从体系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在 12 世纪,东半球有一系列帝国和小世界,其中许多彼此相邻。那时的地中海是一个商业中心,拜占庭、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北非的部分地区在这里相聚。从印度洋到红海地区形成了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陆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成为第五个,但西北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偏远的地区。”^④在沃勒斯坦看来,一千年之前的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多个区域世界秩序,诸多常被认为是边缘地带的区域,事实上都构成了一种具有结构性的区域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各国之间的边界逐渐确定,西欧边界观逐步形成并向外拓展,影响了相关区域体系内部秩序的形成与维持。“雷诺瓦德(Yves Renouard)曾探讨过当今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边界是如何在 1212—1214 年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初步确定的。正是在这些边界线而非其他边界线[比如包括普罗旺斯(Provence)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在内的地中海西方国家,或安茹王朝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包括法国西部在内的大西洋国家]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了民族情感。先有边界,后有民族情绪,这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在 20 世纪的非洲一样,确属实情。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边界划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有边界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这就是佩罗伊所说的西欧政治结构的‘根本变化’。”^⑤其中,民族国家理念成为一种典型特征,并被吸纳进西欧殖民扩张的帝国实践当中。沃勒斯坦进而写道:“民族国家是一个地域单位,其统治者谋求(有时谋求,时常谋求,但并非总是谋求)使它成为一个民族社会。……如果我们记住,自 16 世纪以来,西欧的民族国家谋求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建立相对同一的民族社会,把帝国的冒险事业只作为建立民族社会的一种补充手段——也许是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⑥正如他所指出的,在欧洲国家的世界扩张中,葡萄牙之所以扮演最初的引领者角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时的欧洲诸国,只有葡萄牙最具有决心和可能性,因为欧洲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维系经济的发展,从而补偿领主在危机中所失去的收入。在这种动力之下,欧亚大陆的诸多区域成为最初由葡萄牙、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0页。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3页。

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5页。

⑤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22—23页。

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23—24页。

西班牙殖民帝国，之后被英、法、俄等殖民帝国进一步控制的帝国权力秩序的边缘地带。

当然，在其他一些世界体系论者看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围绕“中心—外围”“A-B（周期阶段）”以及“霸权—竞争”三组关系展开，所呈现的是一种已经存在数百年、具有序列的霸权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竞争、贸易竞争与金融竞争，从而相继形成不同程度霸权的过程。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过分强调了一个中心强国在同时取得全部三项优势之后所维系时段的短暂与易逝，同时也将对全球霸权的学理分析局限到对单一序列的几次短暂霸权上面，从而影响了学界对于全球霸权整体现象的系统分析。^①这一评述在充分承认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宏大框架及其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理解更具整体性的世界体系结构的重要性。而在该过程中，认识并理解边疆问题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内在意义，并将欧亚的场景纳入其间，将为理解世界体系机构的整体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二、欧亚的地位与边疆问题

欧亚大陆作为近代之前人类历史的主要舞台，占据了人类文明史叙事的重要位置。围绕着欧亚区域所展开的世界体系结构，即便是在近代之后拓展到新大陆，依然无法回避对于欧亚大陆本身的理解与认知。在这个大陆结构当中，欧洲影响深远，俨然掩盖了亚洲曾有过的辉煌。但即便如此，在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看来，“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②。在此过程中，经由欧亚大陆两端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徙，塑造了欧亚大陆边疆地带的历史能动性，也让人们得以更为全面地理解欧亚大陆上的长周期互动及其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进而认识到区域并不是平面化的，事实上存在着足以影响人们认知视野和深度的各类“凸起”与“塌陷”，从而需要人们从历时状态的“思考时间”向关注具有不同生态文化特质的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思考空间”转变。^③这种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于之前被同质化看待的各个区域本身的新的理解，以及对这些区域自身的边疆/非边疆定位的全新讨论。

在此过程中，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等世界体系论学者曾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区域转移问题，认为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已经萌发。而到了世界体系研究者这里，“这一体中多种文化的差异事实（社会政治学也认可了这一事实）早就存在了。我们认为，种族、人种、文化、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差异曾一再受到人们的认可，人们也一再适应这些差异。至少在（经济？）扩展时期是这样的。同今日一样，确认并捍卫不同的特性，在历史上也曾是间歇性、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的主要特点。同今日一样，团结在这一大旗或那一大旗周围的行动，在历史上也曾是危机期间共同应付经济萎缩或经济收益增长比较缓慢所造成的生计困难的一种努力。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生活中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对这一事实和关于这一事实所做出的一种‘哲学’思考——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也贯穿于史前时期。”^④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了在区域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如果我们认为世界诸体系一个接一个——但是在解体时期结束后的衔接——形成时所发生的是重组，而不是替代的话，那么衰落就不可能系指各体系本身，而只能是指它们先前相互联系的方式日趋失效。我们说到13世纪世界体系时，意思是说体系本身的转移。……最早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中心地区’……是中亚和印度洋，地中海沿岸地区只不过是其依附地区而已。这些中心地区在13世纪里一直是典型的世界体系。这一格局一直到16世纪才决定性地得以重组。”^⑤对16世纪等这些重要时间节点的理解，构成了思考与认识世界体系的区域变迁的关键环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亚区域对世界体系的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

①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②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9页。

③ 袁剑：《“思考空间”与文明交界带——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文—边疆视角》，《思想战线》2023年第2期。

④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2页。

⑤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12页。

诸如 16 世纪殖民扩张等重要时间节点，也包括如下一些时间节点，如 1405 年被称为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的帖木儿在征伐途中去世，既标志着帖木儿帝国的崩溃，更意味着自成吉思汗以来，草原帝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时代的终结。^①

萨米尔·阿明认为，如今认为现代世界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观点，严重歪曲了事实。实际上，16 世纪之前的社会根本就不是相互隔绝的，至少在地区性的体系里面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伙伴。如果忽视其内在的相互影响，就难以全面认识后续的发展过程。其中，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有些特殊。在他看来，“这一地区本身的疆界就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明确。这一地区早先有一些庞大的帝国——诸如贵霜帝国；这些帝国先是将古希腊时期的中东，后来又将伊斯兰教的中东与印度和中国直接连了起来。这一地区本身在成吉思汗时期（公元 1300 年）成为一庞大帝国的中心。就在这庞大帝国形成的前后，这一地区纳入了伊斯兰教范围。这一地区的组织方式是贡赋式的，时而先进（其表现为高度的中央集权），时而又陷入‘封建’格局状态。然而这一地区的主要特点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了东西方（中国、印度、中东、远至这一体系的各外围地区）贸易的必经要道。这陆上通道自古即与海上通道相竞争，一直到 16 世纪才失却其重要性。”^② 他的这一论述，凸显出欧亚大陆陆上通道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中亚地区在 16 世纪之前的世界经济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则通过对各区域内部体系的细致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各个地区性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呈现的“连续性”。她认为，新的全球化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地区性体系重要性的下降甚至丧失，而是存在一种极其长期的、起伏不定的周期性发展进程，这种周期性往往会有“间断”与重建的时期。在此基础上，认为某一特定地区经济活动具有连续性甚至一直在不断完善，与认为这些特定地区越来越落后于体系发生变化的平均速度或者说这些地区越来越显得落后，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可以共存。^③ 这种情况，当然也存在于欧亚大陆及其内部边疆当中。

三、边疆事务与欧亚流动性

历史情境提供了理解和认识边疆事务与欧亚流动性之间的重要维度。卡尔·施密特在谈及世界各区域的制度—文化类型时，曾指出：“在东方和西方，古代和中世纪高度文明地区的大型政治体上所产生的文化种类，不是内陆型的，就是河流型的，最多也只是内海型的。因此，他们的空间秩序的法则，并不是像迄今为止的欧洲国际法那样通过‘陆地—海洋’的对立来确定的二元体系，也就更谈不上与此对立的超克。在东亚和印度帝国是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有东方印记的地区也是如此。”^④ 这一论述指出了古代政治体的非海洋特质，但忽略了边疆在欧亚大陆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一方面，边疆提供了理解欧亚流动性的时空基础。历史上跨越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作为古代世界文明交往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生态网络，同时也呈现了整个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及其边缘地带的历史互动路线，而边疆地带在这些历史互动中具有一定的能动特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欧亚大陆乃至整个古代世界的走向。例如，12—14 世纪的亚洲历史，在世界史上又被称为蒙古时代，这一时期的蒙古势力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地带，同时也开辟了欧亚大陆东西方新的贸易通道。^⑤ 这种通道，构成了理解欧亚流动性的物质条件，广袤的边疆内部存在的诸多历史与现实人员、物质与信息通道，为这种广泛的欧亚流动性提供了必要的时空基础。

① 参见[英]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② 萨米尔·阿明：《古代世界诸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载[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319—320 页。

③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间断性与连续性：单一世界体系还是体系系列？》，载[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第 347—348 页。

④ [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9 页。

⑤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17 页。

另一方面，边疆则为理解欧亚大陆的周期性变迁提供了时代契机。这种周期性变迁在古代呈现为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此起彼伏，并以王朝鼎革与政权兴替的形态展现出来。进入近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欧亚大陆传统的游牧—农耕力量的角力与互动被工业力量所整合，最终被纳入西方殖民帝国的秩序框架之中，成为近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与英国在欧亚大陆腹地与沿海的推进与竞争，构成了欧亚大陆的近代权力周期，正如麦金德所言：“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都铎世纪曾经目击西欧在海洋上的扩张，也看到俄国的势力从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的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①进入21世纪，近代的英、俄殖民帝国秩序早已烟消云散，但欧亚大陆的周期性变迁依然在进行，正在走向新的历史端口。在此背景下，欧亚的边疆区域本身也在形成新的身份与角色定位。

四、中亚的位置：贡德·弗兰克的开创性解释

如果将世界体系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往前推的话，可以发现，途经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流，并成为古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维系纽带。到了蒙古时代，形成了第一次以广义上的中亚为重要枢纽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荣光一直延续到17世纪蒙古各大汗国覆灭为止。而在这之后，随着西方海上贸易和海上军事力量的拓展，曾经占据欧亚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中亚失去了它曾经的地位。

贡德·弗兰克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中，有力凸显了东亚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他著名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呈现了一个超越先前世界体系理论，包括他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论断的新认知，那就是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在实际上是很次要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②，东亚在世界经济史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在具体的论述中，他首先提出了对于既有的欧洲中心观的质疑：“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欧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③这些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论述者们，“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就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对‘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④可见，曾经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群体及其历史，其意义需要重新加以评估，并进一步去理解和认识其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的应有地位。^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东亚的地位进行有力论证之后，弗兰克又对中亚的连接性地位进行相关的分析，并提出了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央性”（Centrality）问题。他的这一重要论述出现在1992年，这是一

①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5页。

②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27页。

③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3—24页。

④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4页。

⑤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21—22页。

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作为世界“两极”之一的苏联在1991年年底刚刚解体，中亚诞生了五个新独立的国家，世界也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沉浸在自由主义普遍胜利的氛围之中，弥漫在对所谓“历史的终结”状态的想象当中。弗兰克的这一论述，从结构层面上补充了他自己关于欧亚区域定位的缺漏与不足，并形成了一种兼具东亚与中亚的亚洲地位的整体结构观，全面呈现了整个欧亚结构中的亚洲地位，并揭示了亚洲自身在区域性世界体系结构中的独特优势。

弗兰克指出，对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体系性分析的人来说，离开中亚来分析世界都是不够的，中亚有其特殊的中心地位。学界对于中亚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一个“黑洞”式的状态，一方面会认为这一地区非常神秘，非常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没有去进行深入的探究，而满足于东方学式的想象与表述。他的这一论述直面了学界在理解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时的知识状态，并认为，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这是一种最为深刻，也最具标志性的从中心向边疆的转变。

弗兰克进而指出，历史绝大部分也是从关于“民族”国家或者大多数关于“文明”的民族角度加以书写的——历史是被胜利者所书写的。此外，不管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历史书写或者书写的历史都是极度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已经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关于“西方”的历史书写，而且也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对于“东方”和“南方”的历史书写。甚至一些非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時候，也已经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病毒的影响。它使人们对中亚，尤其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任何重要或美好事物都迷惘不知。以中国为中心、印度为中心、波斯为中心、伊斯兰为中心的历史及其他历史也往往忽略了对中亚的适当参照，甚至中亚对其自身历史的巨大影响也未被重视。

“文明开化”的民众书写着关于他们自己的，而非他们“蛮夷”周邻的历史，这些蛮夷在他们看来是在历史之外的。弗兰克认为，中亚在国家间关系和世界史中所占据的千年之久的中央性都几乎没有被关注，更不用说在世界体系史中的中央性了。只有一些关于中亚某部分地区进行研究的专家才注意到，但这些部分反过来又被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忽略了。此外，苏联等国的政治环境几乎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将外国研究者隔绝在外。而这一因素也使得在外部世界对中亚的研究形成了一整代的断层。而如今，情况正在改变，新一代的学者正在崛起，如今的中亚正在等着被外部世界所发现和探索。这正是中亚在这个外部世界的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中央性。^①

在弗兰克的这一分析框架下，中亚具有了冲破英、俄殖民帝国结构的体系意义，同时也呈现出作为欧亚边疆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不仅在于中亚区域自身在整个欧亚大陆中独特的地缘位置，更在于这种地缘位置在欧亚力量20世纪的历史性崛起与复归过程中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五、理解欧亚新边疆 重建认知新秩序

当代的世界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出现在世界体系与地缘政治方面，它构成了理解整个欧亚大陆及其边疆区域重要性的新契机，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对于欧亚大陆未来能动性及其实践路径的新图景。

自16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欧亚陆上丝绸之路被西方殖民力量的海洋线路逐步取代，作为欧亚边疆地带的中亚及其周边区域，也被卷入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为模板的世界体系格局当中。但值得注意的是，

^①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亚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袁剑译，《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2期。

这种近代世界体系的生成与区域拓展，并不必然决定着区域性世界体系的衰退与消解。欧亚大陆的边疆区域，诸如中亚等地域的数百年历史与时代变迁，正在凸显区域性世界体系的新的可能。学界有必要在深化对诸文明及其中心理解的基础上，去更好地理解欧亚大陆文明交界带中的边疆空间及其人文—生态价值，进而对中国自身的域外知识空间及其秩序结构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①

当然，这种认识也必然需要直面历史演进的现实，尤其是直面诸如中亚等区域从英俄殖民帝国争夺的边疆地带中逐步挣脱，并成为新的世界体系与经济秩序参与者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展现了这些区域如何记述古代所具有的“非边疆”的核心地位的历史场景与历史记忆，又凸显出这些区域如何在近代殖民帝国的世界扩张中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逐步被边疆化，进而成为英俄等殖民帝国统治秩序的边缘与半边缘角色的近代转折，更呈现出这些区域如何在20世纪得以挣脱被强加的帝国殖民秩序，将其自身的地缘边疆位置转变成主动参与世界秩序的新边疆状态。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正在激活中亚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欧亚边疆，中国—中亚的知识与实践关联性正在日益增强。在可以期待的未来，在一种新的秩序结构中，我们也将逐渐看到从外围、海洋和西方向中心、陆地与东方的力量转变，这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

World System Structure and Frontier Issues: Reflections Centered on Eurasia

YUAN Ji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World system theory, a far-reaching structural discourse, aff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oning. As one of the major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Eurasian continent, such as Central Asia, the Eurasian frontier region, has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world system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has experienced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glory to decline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network and the order of modern colonial empires. By interpreting Gunder Frank's classic narrative of Central Asia and its status in the world system,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frontier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system. On this basis,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China-Central Asia connection can be deepened.

Keywords: World System, Structure, Frontier, Eurasia, Relation

[责任编辑：赵蔚平]

^①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关于边疆、周边与外域认知空间关联性的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